

中国新闻评论

China News Review

2024年1月第5卷第1期

The Memories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me and the Essay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Zhao Zhenyu

Abstract: As a political discourse genre that integrates news and literature, essays have always been favored by peopl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recalls the years of the associations with the essay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then uses Mr. Fang Hanqi's inscription "A thorough materialist is fearless" for the book of "Telling the Truth" to express the author's consistent attitude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

Key words: Essays; Telling the truth

回忆与杂文报刊交往的文字岁月

赵振宇

摘要: 杂文作为将新闻与文艺融为一体的政论文体，一直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本文中，笔者回忆了自己与杂文刊交往的文字岁月，并借用方汉奇先生为《讲好真话》所作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题词，表达了笔者在新闻学学术研究和杂文创作中的一贯态度。

关键词: 杂文；讲真话



作者简介：赵振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讲座教授，新闻评论研究中心顾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原主任。曾任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有多篇评论作品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湖北新闻一等奖。

文章引用：赵振宇. 回忆与杂文报刊交往的文字岁月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4, 5 (1): 1-17.

<https://doi.org/10.35534/cnr.0501001>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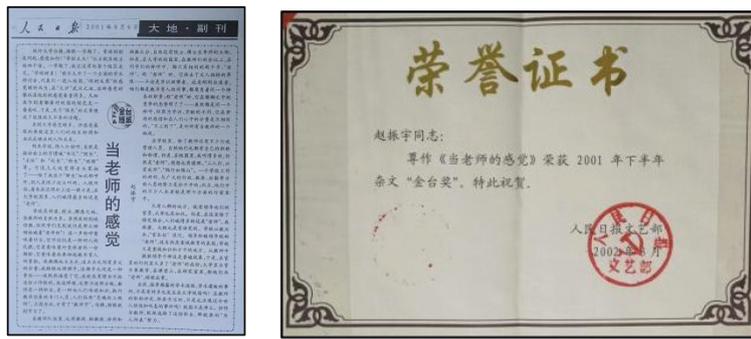
杂文作为将新闻与文艺融为一体的政论文体，一直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青睐，鲁迅先生是一面旗帜。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杂文是人们最早“重拾”起来的“批判的武器”，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也带来了杂文“武器的批判”。^①这里需要介绍的是中国第一份《杂文报》和《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杂文征文”。

《杂文报》创刊于1983年，由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扬主持创办。1994年，《杂文报》被中国新闻学会、北京工人集报协会评为“我们最喜爱的全国百家优秀报刊”之一。在办好报纸的同时，杂文报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杂文活动，利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团结全国广大杂文作者，繁荣杂文创作，促进杂文事业的发展。1985年，杂文报组织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杂文研讨会——北戴河杂文研讨会，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名杂文作家、杂文编辑和杂文理论研究者前来参加研讨。该报先后与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联合开展杂文征文活动，与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杂文鉴赏辞典》，有人称其为我国第一部有关杂文的百科全书。从1985年开始，杂文报创办了杂文刊授学院，共招收9期学员。组织编写了我国第一套较为系统的杂文教学丛书，共8种，一百多万字，培养学员达八千多名。杂文报还在全国组建了39个通联站，初步形成杂文的信息网络。该报曾在2011年改版，改版后的报纸每周发2期，分别在周二、周五发刊，版面为8版4开。《杂文报》于2014年12月25日刊发启事，2015年1月1日起停刊。

1988年7月至9月，《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举办了一次“风华杂文征文”活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收到7000多篇来稿，编辑部选择了61篇刊出。12月15日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在《民主兴，杂文盛》的消息中称：此番征文举出“鲁迅精神是杂文高举的旗帜”。集于麾下的，文化人自不必说，基层来者如干部、技术员、个体户中也大有精粹之作，人数是一半对一半。于是，“以凤引凰”，《人民日报》的“大地”上一片唱和之声。究其故，是因为撰文者切近现实，由此激发情感，为改革开放为民主科学鼓与呼。在民主渐进的今日，终于迎来了杂文的一次“无霜期”。有群众来信称：“专家学者、平民百姓平等参与，充分体现了我国

^① 涂光晋. 时代之“声”——新时期中国新闻评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36.

言论自由和学术研究的和谐气氛。”柯灵赞：“杂文繁兴是思想活跃、言路通畅的表征。”；秦牧为此作一总结：民主兴，杂文盛。他说：“蒸馏水般的社会既然永远不会有，那么，让杂文更兴盛起来吧！”《人民日报》1991年开办《金台随笔》专栏，将副刊杂文化，季度评奖与举办征文活动，成为该栏目经常的运作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大地”副刊一度出至周三刊，几乎每期都有1篇以上的杂文见报，每年刊登的杂文多在百篇上下，有的在发表时还配发了漫画。漫画的巧妙配合，使杂文增加了可视性，而杂文与漫画的适当搭配，也成为《金台随笔》栏目的一个特色。2001年我调入大学，为该栏目写了一篇《当老师的感觉》（2001年9月6日），反映了自己职业转行的感受，获得当年“金台奖”。



这就是当时媒体上杂文写作和刊发的形势。正是在这种文字环境里，我也学习写作了一些杂文，感受到在杂文世界里的另一种文字乐趣。

《杂文报》是刊登杂文最多的地方，也是我投杂文稿最多的媒体。多年来，该报先后刊发了我写的多篇杂文随笔，有的还获得了奖励。“民主兴，杂文盛”促使了全国不少媒体纷纷开辟杂文、随笔专栏专版，那里也是我写作的广阔天地。20世纪80年代，写杂文生意兴隆，也颇叫座。全国性、地区性、联谊性的杂文大奖赛、小奖赛此起彼伏、连年不断。优胜者除了能获得精美奖状、丰厚奖金外，还有“二锅头”“老白干”若干，以酒助兴，舞文弄墨，“老九”们自然悦乎！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在媒体上经常可以读到某某大官被揭露之事。但是，读了这些报道却不免生出一些思绪来。一日读新华社报道得知，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严重违纪违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给予张国光开除党籍处分。鉴于张国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此案已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湖北又挖出了一个腐败分子”，这是报道给国人的第一印象。

那么，张国光到底是哪方人氏，犯了哪些法呢？从资料中查询，张氏系辽宁绥中人，长期担任沈阳市和辽宁省的负责人，1998年任辽宁省省长，2001年2月调入湖北后任湖北省省长，2002年10月辞去省长职务。报道中说，他在辽宁工作期间（未提他在辽宁的职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以及收受礼金、贵重物品共计折合人民币96万余元。消息中只字未提他在湖

北的罪行。一个长期生长在辽宁工作在辽宁的领导人，到湖北不满两年就被抓出来了，实在令人费解。于是我写了篇《张国光怎样当上湖北省省长的？》——

张国光调到湖北，是由中央任命并通过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选的。从组织和法律程序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当时就有传闻，他和“慕马案”有关，调虎离山是为了便于查清辽宁的大案。从现在公布的情况来看，这种传闻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腐败嫌疑人”，为何非要调到湖北才能解决辽宁的问题，而且还要出任行政一把手？须知，湖北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全国处于重要的位置（即使安排其他省区也是不妥当的）。如此重任让一个“腐败嫌疑人”去掌权，他能搞好工作么，如此这般对得起湖北以至全国人民么？不论哪个方面说，这样的安排调动都是不妥当甚至是错误的。将一个“腐败嫌疑人”确认为“腐败分子”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希望有关方面再动动脑筋，想想别的办法，不要让以后的“腐败嫌疑人”再异地做官。办法总会有的，我相信。

文章中还写道：“从查询中我还得到这样一条消息，当时张国光当选省长是经过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644位代表投票通过的。一个‘腐败嫌疑人’竟然通过大家的一票当上了主持全省行政工作的一把手，作为人大代表来说，难道不也该反思一下么？”

最后要说一点的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当时，至少是辽宁和湖北的媒体对张国光的调动是有议论的，而且有的记者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或通过有关渠道向上面反映一下呢？如果当时有适于媒体发表不同意见的环境，又有一些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记者们，我想有关方面和省人大代表也是会作出新的决定的。最近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对舆论监督有了新的保障和要求，以后的事情或许会好一些的，我希望。

张国光作为湖北省出现的贪官，由他而起的质疑文章在湖北当地多家媒体却发不出去。辗转两个多月后在外地的《杂文报》上发出来了，而且上了网易2004年度热点关注的第二条。反腐败一直在路上，腐败分子和反对腐败分子的文章也就不会少。只是希望二十年前“张国光”一文中出现的问题少一点再少一点。



(2004年4月6日,《杂文报》)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打着“负责”旗号的不负责行为,混淆视听,害人误事,严重的还祸国殃民。比如说,因为外校组织师生出外活动发生车祸,为了对师生和家长“负责”,于是本校发出通令,取消一切组织师生外出旅游、开会、考察等活动。因为一处小煤矿、小砖厂、小作坊发生事故,为了对上级检察机关“负责”,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一纸命令,停开一切小企业(也不论这些企业是否合法,是否有效,是否对社会作贡献)。因为要迎接各种各样的节、庆、会,为了对各种形象工程和上级首长“负责”,停止或拖延了原本就很急迫的城市建设,以至给城市居民造成三年至五年的出行不便和由此带来的众多麻烦,行政首长解释,这是为了市民美好的明天……

针对这种现象,我写了一篇《警惕“负责”的不负责行为》——正是因为他们的“负责”,没有了车毁人亡发生的可能性,免去了师生家长担心的后顾之忧;正是因为他们的“负责”,关闭的小企业再也不会冒烟轰鸣,不会发生安全事故了;正是因为他们的“负责”,在节庆会期间,城市干净、交通畅行,各位领导、客人笑盈频频。

但是,正是这些貌似负责的行为却恰恰是一种很不负责的举动——正是因为他们的不负责行为,使师生们失去了走向社会,走向实践,感受大自然的机会,温室里能够培养出栋梁材吗?正是因为他们的不负责行为,使那些守法的小企业倒闭,大量务工者丢掉了饭碗,煤、砖等商品价格猛涨,由此,是否又促成了许多新的腐败滋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负责行为,城市居民承担了他们不该在那个时间、地域和程度承受的苦痛,决策失误难道不是最大的失职么?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打着“负责”的旗帜,实际干着不负责任的事情,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干部考核和任用机制上还存在着严重问题。说假话,干假事,一切都是为了对上级领导负责,而有时候有的上级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正需要这样的下级表现。“上有所喜,下必效焉”,扭曲的干部任用和社会赏罚机制才造成了当下的不负责任现象。至于社会上时常出现的以人头担保“负责”的,以党性原则“负责”的,以丢乌纱帽“负责”的,以巨资赔偿“负责”的,我们更不要相信他们。



(2008年8月19日《杂文报》)

今天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但是这种以“负责”姿态出现的不负责行为，仍然表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坚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使广大干部真正担当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来，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时下，各地经常会举办一些诸如经验交流会、典型报告会、理论研讨会和决策咨询会等一类的会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会议。大凡这样的会议，有关方面的领导也都是十分重视的：主席台上有他们的身影，会议日程上有他们的致辞，与代表合影的照片上有他们的形象。一日，笔者应邀参加一个关于和谐社会与媒介责任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作大会发言时无意中发现，台下前排的座位席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些参加大会领导人的台签，却没有他们的身影。于是，我就此发表了一点感慨，问了一句：“前排就座的领导哪去了”，结果引起与会代表的一阵共鸣。会后，我写了一篇《前排就座的领导哪去了》——

.....

领导者参加一些会议，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姿态，更重要的在于，这样的会议往往能为领导者提供一个紧张有效的学习和掌握民情实情的好机会。既然如此，我们的各位领导同志，有什么理由只出席开幕式与代表合影后就离会了呢？我不解。

领导人一般都很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领导人很忙，平时就很难有时间坐下来系统学习、听取和思考一些问题。凡事我们都讲效率，讲投入和产出之比，在学习和掌握实情方面我们也要提倡讲效率。有选择地参加一些高质量的会议，自始至终把会议开完，也是一种讲效率、求真务实的表现。我们应该提倡这种工作和学习方式。

这里讲的是那些很重要的会议。对于那些只需要领导者上台剪剪彩、照照相的会议不在此评论之列。



(2005 年 8 月 30 日《杂文报》)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是一个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专版，“杂文”是他们的一个品牌，

我也学着写作，其中有两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1990年举办的亚运会上，我国某些传统获奖项目中出现了危机，如乒乓球比赛，男团失去了决赛的机会，女子双打又败于韩国拍下，金牌和奖牌被别人夺去了。于是乎，有人大呼“狼来了”。就此，我写一篇《“狼来了”又何妨》——

.....

自然界的狼来了，会夺走小羊羔；体育比赛中“狼来了”会夺走金牌、银牌、铜牌。作为牧羊人，作为运动员、教练，当然应该提高警惕，增强敌情观念，根据“狼来了”的特点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亡羊补牢为时还不晚。羊丢了，奖牌丢了，还高枕无忧或幸灾乐祸，便有马大哈甚至居心叵测之嫌，不足为取也。

然而。世界上的事很复杂，很多情况需从多方面看才是，“狼来了”便为一例。

“狼来了”好不好？

其一，不好。由于“狼”先生的到来，把本来该我们夺取的奖牌夺去了或在我们摘取奖牌的征途中设下障碍。如果一路顺风，全部奖牌囊括，那该是多么风光的事呵。“狼来了”当然不好。

其二，正是由于“狼”先生的到来，才使我们领教了“狼”的各种招数，在和强手的对峙中暴露出我们的不足和弱点，找出差距，迎头赶上。因“亡羊”才去“补牢”，还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交学费”么？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这难道还不是“狼来了”的功劳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则还是时而有“狼先生”光临才好。

“狼来了”又好又不好，这似乎很矛盾。其实，世上的许多事都是这样对立的统一，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

试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中华儿女囊括了亚运会和世界奥运会全部奖牌（当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假设），那么还有必要举办亚运会和世界奥运会吗？

“狼来了”需要提防，但没有了“狼”就好了吗？



(1990年10月11日《解放日报》，1990年12期《新华文摘》转载)

大千世界，纷纭繁复，既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也有许多简单的问题。一般来说，复杂问题，由于其种类多，头绪杂，涉及面广，牵扯因素多，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较为吃力、费时；反之，简单问题，结构单纯，头绪少，涉及面窄，牵扯因素少，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容易、迅速一些。尽量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不复杂是可行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涉及人们利益或关系某项工作决策时，却总有那么一些人恰恰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给忘记了（不一定是无意的），屡屡出现把该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怪现象。为探究此怪现象，我撰写了《关于“简单的事情办不好，复杂的事情办得漂亮”之研究》——

……

美国休斯公司副董事长鲍夫曼对中国发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气象预报、发射时间、卫星入轨的精确度大为不解：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有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办不好，但这么复杂的空间技术居然干得如此漂亮！

谁来帮鲍夫曼解开这个神秘奇怪之谜？

有人说简单的事情很容易就办好了，办事者的能耐何以体现？有人讲，办事情就讲认真，事情办得太快，难免有草率之嫌；也有人说三处九科一十八股，如此众多机构，人人过问，不是更能体现民主的作风、集体的智慧吗？也有人讲，并非所有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办得漂亮，这要看谁交办，谁去办，为谁办；当然也有人讲，这是鲍夫曼故意挑中国人的毛病，希望我们把复杂的事情办糟，把简单的事情办砸，别理那一套，走自己的路……

呜呼！但愿这些都不是正确答案！



(1991年9月15日《解放日报》，1991年11期《新华文摘》转载)

《文汇报》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日报。该报不仅报道、理论宣传做得好，副刊也很有影响，“杂文”就是一个名牌专栏。我在上面写过一篇《假如我又活了》的杂文，

是因为我在前一年《武汉晚报》举办的“全国晚报杂文大赛”上曾写过《假如我死了》一文。

在一年前论“死”的文章中写道：“那天，我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沉浸在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简洁有力的乐曲里。突然耳边传来十分熟悉，带有地方色彩的铿锵声语——安息吧，我们的好同志！你要求入党十八年，是一位经得起组织考验，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在思想上已经入党的真正共产党员。现在，我宣布机关党委的正式决定——我太累了，没有听清后面的话……”

我再也睡不着了干脆把耳朵竖长一点，眼睛是睁不开了——你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你刚正不阿，实事求是；你关心老同志，热爱下一代，堪称青年楷模；你人到中年，还是孑然一身，真是晚婚晚育的模范。缓缓而行的告别人群中，不时传来抽泣和叹息声。我仿佛听见老丁说我思想解放，开拓创新，小王说我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老肖说我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小杨说我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假如我死了，人们还像对活人那样待我，假如我还活着，人们像对待死人那样对我，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年后论“活”的文章中我写道：“现在首先宣布，撤销去年对你的悼词。你十八年始终不渝地要求入党，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未能如愿，说明你还存在不少缺点、弱点、毛病。现在你又活了，再接着努力吧！副科级的任命虽然已经批下来了，因为你又活了，加上群众也有意见，暂缓宣布执行；准备调给你的两间总共12.5平方米的住房，因为你的死亡警报已经解除，改作他用；你用三年时间研究写出的那份学术论文已打出清样，原准备送出去发表，现在你又活了，咱们就慢慢来研究一下，好好推敲，不要忙于发表了……接踵而来的人群，还在漫无边际地发表各种议论，重新‘正确’认识我这死灰复燃的生灵。我听着听着，不禁长叹一声：‘假如我活了，人们还像对死人那样待我；假如我死去，人们像待活人那样对我，那才真是好啊！’”



(1989年4月24日《武汉晚报》第6期《杂文家选刊》转载) (1990年9月14日《文汇报》，1990年)

就生死话题，我还在《云南日报》写过《更新一下“死”的观念》（1991年1月18日）《悼词外的颂歌》（赵振宇著《与灵魂对话》19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遗嘱》和《豪华墓地为哪般》（分别载于1994年8月20日和12月24日《吉林日报》）等。

报纸上经常有关于狗咬伤人、咬死人的报道。君不见，那打狗制狗者也大有人在。据《春

城晚报》报道，云南省丘北县一农人将该县酒厂党支部书记的一条花狗打死。结果呢，打狗者披麻戴孝，为死难之犬上坟，并从东门到西门沿街学狗爬，这算不算英雄创举？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苏省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氏养一狗，咬伤多人，受到公安、防疫、新闻部门的干预。结果呢，他比那位支部书记更厉害——“群众算什么东西”，“我还在位，只要我一跺脚，你们就别想出沛县城！”为此，我写了一篇《狗咬人，新闻乎》——

.....

人已死去自然不能复生，但疯狗的主人在哪里，我想不难找到。即便是条丧家犬，将其击毙，我想也不是件难办的事呢吧？但终究未见下文。

什么是新闻的定义，这是新闻学家研究的事，我不明白，也不便评说。但作为市民，我总在想，狗咬人，人打狗这类事还是别当新闻好。

早年，鲁迅先生就有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檄文。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没打死的狗，也不知如今又繁衍了多少代子孙和异化了多少个新品种。但先生说的“狗性总不大改变的”，“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总是对的。我想，这话大概不是仅仅对那位支部书记的花狗、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黄狗的吧？



(1989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获该报“求实篇”征文甲等奖)

人生在世，总要做很多很多的事，也要听很多很多的话，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和去世时人们的评价相一致该多好啊！人活在界，历经沧桑，砥砺前行，如果处处都能听到离去时的话语，那么对奋斗者来说该是多大的激励！假如我死了，那毕竟是“假如”，假如我活了，可却是真实的存在。死亡只在一瞬间，生活却要付出很多。为了让“假如”更美好，为了让存在更真实，作为这个时空中的你、我、他，我们大家，不是更需和谐相融、互励共进吗？——这确不是假如，而是真实的存在啊。

在有些情况下，随便说说，不仅可以而且还会收到好效果。但是，不能凡是讲话，都随便说说，那样不但有损领导形象，影响群众对领导的信赖，而且还可能因讲话的随意性贻误工作。前不久，听说一个留学生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就国内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与有关方面负责人举行了一场座谈会。没想到负责接待的某位领导干部，打着哈哈说，今天很高兴与同学们见面，但本人没有什么准备，就随便说说吧。同学们一听，这么重要的会议，本想就一些不解的问题听听领导同志的意见，没想到这位竟没有准备，随便说说。有的同学当即便告辞了——“谁有时间听他侃大山”——座谈会不欢而散。

为此，我在《随便说说》一文（1991年8月5日《经济日报》）指出：“身为领导，出席重要会议，既要讲话，就应认真准备，有的还须集体研究、讨论。逢会必讲，逢人必讲，讲起来不受时间、范围、政策的限制，想到哪说到哪，怎么方便怎么说，这种‘随便说说’的作风在某些时空里是不适宜的，在某些文字表述里也是不妥当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随便说说’也并非领导者的专利，凡正常人开口讲话都会碰到，都该提醒一下自己才是。”此文获得该报举办“王府井随笔征文”的奖励。

改革开放，新观念、新事物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各地开展的“假如……”活动便是一例。君不见，商店开展“假如我是一个顾客”活动，改善了服务态度；医院开展“假如我是一个病人”活动，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机关开履“假如我是基层，我是群众”活动，转变了工作作风。真可谓，神州大地处处都“假如”，就连小学生也不例外。前几年羊城开展“假如我是市长”活动，不是有一位小学生因提出一条好建议而受到广州市市长的接见和嘉奖吗？

为此，我在《假如没有“假如”》（1991年9月30日《法制日报》）一文中写道：“说‘假如’活动好，是因为它确实可以促使人们转变态度、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在需要开展‘假如’活动的地方和时间还是开展一些为好。但是，开展‘假如’活动的基础是人们的情感，而情感的变化是不稳定的。即使‘假如’那阵子做好工作，也难以保证‘假如’以外的更多时间（这才是真正社会角色的时间）有好的表现。搞好本职工作，这是岗位职责对每个岗位人的要求，这里不需要任何假定关系。为达此目的只有从理性的角度，在法制的轨道上，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假如各地区、各单位、各行各业都做到这点或都努力去这样做，那么，我们还需要开展‘假如’活动或大力提倡开展‘假如’活动吗？我们的新闻媒介还会有大量宣传‘假如’活动的报道吗？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假如。”此文在该报“良言征文”征文中获奖。

“辩证法承认世界上的事物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和转化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就是一例。然而，近来翻阅设报刊，发现了另一种‘坏事变好事’……

在大力宣传‘坏事变好事’时，也应该想一想这些‘坏事’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该吸取哪

些教训?这样,我们才能聪明起来,少犯或小犯一些错误,尤其是避免犯那些重复性的错误,从而把我们的事情办好一些。领导要走在‘运动’的前面,随时掌握工作进程,把问题和乱子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坏事变好事’的前提;科学地总结错误和挫折,从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是少出乱子或出了乱子能迅速纠正、平息的重要保证;明确当事者的责任,对官僚主义,对渎职、过失、消极怠工者(领导者和执行者)予以行政或刑事的追究,是促使‘坏事变好事’并少产生坏事、多办一些好事的关键所在。有了这几着,还会左一次右一次地‘交学费’吗?”(1990年7月9日《南京日报》)

我在《深圳特区报》“议政茶座”写了一篇《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衰》——

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们主观认识上的问题或心怀叵测者外,大都与社会提倡什么、奖赏什么,反对什么、惩罚什么有关。试想一下,如果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的人都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如果做表面文章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者都要受到指责和处罚,有谁还敢如此胆大妄为?当然,用形式主义来糊弄自己,又用形式主义去欺骗别人的人自然不是什么普通人。所以,反对形式主义,讲究求真务实,重要的还是从领导者做起。建立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对于真抓实干卓有成效者予以奖赏、表彰,对弄虚作假空谈误国者予以惩处、批评,难道不是杜绝形式主义的重要一环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坚持反对形式主义。党的十九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新华社调查的新表现中有一条就是“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201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出路在哪里?我在201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一版“今日谈”评论中写道:“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作风怎样,群众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现实中,为何有的干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除了权力观、政绩观出了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评价没能转化为影响干部去留升降的硬杠杆。在这个意义上,要让‘群众意见’得到实质性尊重,既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也有必要进一步用好群众的评议结果。作风好不好,群众来监考。‘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联系群众,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更好地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才能以好作风成就新作为。”文章不长,讲的道理却是真切的。只要我们思想明确了,制度落实了,人民群众的意见能够确实确实决定干部的职位了,那么在全局上,在大势上,形式主义还不能有效地被扼制吗?



(1995 年 3 月 1 日《深圳特区报》“议政茶座”)

我先后在《福建日报》刊发《“要奖”与“给奖”》（1993年2月13日）、《婆婆也不是好当的》（1994年12月11日）、《谁是真正的上帝》（1990年5月26日）、《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1996年7月3日）、《要廉政更要勤政》（1996年6月6日）等文章，前面两篇杂文还在征文中获了奖。前一篇文章写的是：当今时代竟有人公开大模大样要求奖励了。报刊上有人做文章，对伸手要表扬的人伸出一个指头刮脸皮，看来是持否定态度了。我在文章中写到，奖励是重要的，国家宪法和法令都有明确的规定：“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特别要办好若干种代表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被视为崇高荣誉的奖励”。一个人仅为个人的名利而劳作，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社会如果忘了对人们的奖励，那么社会正气将难以树立，社会生产也将难以迅速发展。谁对奖励轻视，必将受到轻视奖励的惩罚；同样，谁对奖励滥用，也必将受到滥用奖励的报复。为何有人敢于不要脸面要表扬，为何有人作出了卓越贡献受不到应有的嘉奖，为何有人把奖励当成自己的私物可以随意赐人，这些难道不该引起奖励法规制定者、执行者们的深思吗？后一篇文章是对行政管理中上级机关如何与下级管理部门处理好相互关系问题发表的一些意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仅中国内地报刊上的杂文兴盛，香港地区的报纸也常常刊发此类文章。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消费还有强迫的吗？有，朋友碰到过，我也遇过。一次，朋友慕名到南方一城拜名楼。导游小姐递上一张登楼门票，朋友喜握。紧接着，导游小姐又递上一张欣赏音乐的门票，朋友纳闷了，音乐会哪儿没有，为什么跑这么老远来欣赏？虽说是当地出土古乐器演奏（其实只是放放录音磁带而已），听不听也得由游客自己决定呵，哪有强迫人“欣赏”之理？后来才知道，这些门票都是要掏钱的。就此，我写了《强迫也能促使“消费”么》——

早些年货物紧俏时，常有强迫搭配销售的现象。如今，形势好了，消费者持币待购，强迫搭配销售的现象没了或很少见了。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参观、旅游、欣赏的机会渐渐增

多了。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一切从事经济、文化、服务等行业的同志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强迫消费”不能算是一种好办法。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竞争原则，即优胜劣汰、按质论价。任何企业、任何单位，要想赚钱，要想吸引消费，要想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一点在于生产优质的产品、提供良好的服务。“微笑服务”何以受到推崇，以我之见，便是以优质的产品、良好的服务使消费者“愿者上钩”、常来常往。做生意都想图个吉利，长有长发。但“强迫消费”只是短期行为，命肯定长不了。当然，要使消费者“愿者上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要经营者们认清了形势，多动一些脑筋，办法总是会有的。这里还想补充一句，对于那些提供“强迫消费”者，有关方面应该干预一下才是。



(1993 年 3 月 28 日香港《大公报》)

我在《舌头的功能》一文中写到——

舌头，除了有辨别滋味的的作用外，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发音说话。大凡正常人哪个不说话呢？可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说起话来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叫人听了感觉舒服，想要信服；有的人说话丢三落四，东扯西拉，听者往往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无底；有的人说话丁是丁，卯是卯，好是好，坏是坏，不夸大，不缩小，对上不卑，对下不亢，有成绩说足，是问题讲清，可谓一片真心可对天；有的人挤眉弄眼，阿谀奉承，欺上瞒下，颐指气使，好人可以说坏，坏人可以说好，大事可以说小，无事可以生非，有道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有人说讲好话容易，我看未必。成绩虽然都讲足了，但像开中药店样样都有、面面俱到，

以谁为纲，如何发扬才能使整体素质都有提高，榜样如何树立，经验如何介绍，把好评说好可得要动番脑筋才是；有人说批评人最容易，不讲情面就行了，不是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吗？话虽这么说，但想治病又想吃甜药的却不少，各种糖衣片不是应运而生吗？看来，要想批评人有好效果，选择对话的时间、地点、谈话人和问题的切入点是十分重要的了。把好评讲好不易，把批评话讲好更难，这也是一门艺术。

其实，难的还在后面——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信息在传递中的扭曲却是最难防的啊。请记住：常在你面前说人家如何如何的人，一定不要相信他亲近他，因为，他也会在别人面前说你怎样怎样；同样，也莫忘了，如果你老在张三面前说李四，在李四面前说赵五，最后就会说到你自己。千万不要去干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联合别人来打倒自己的蠢事。



(1993年10月4日香港《文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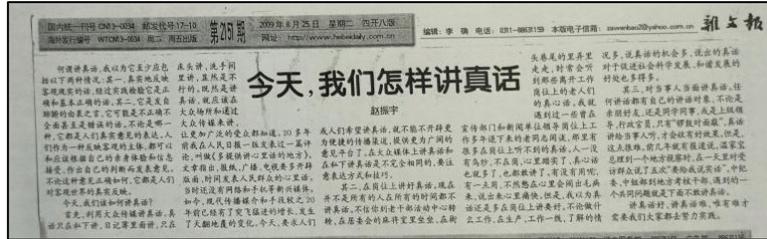
讲真话是人的本能反映，讲好真话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在《杂文报》上写了一篇《今天，我们怎样讲真话》——

何谓讲真话，我以为它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其一，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话，经过实践检验它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话。其二，它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它可能是不正确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话。不论是哪一种，它都是人们真实意见的表达。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真话？首先，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其二，在岗位上讲好真话。其三，对当事人当面讲真话。其四，讲真话要合法规、合情理。

讲真话好，讲真话难，唯有难才需要我们大家都去努力实践——要有新闻的敏锐和理论的深刻，能在发现问题或问题端倪时快说真话；要在人们趑趄不前、嗫嚅而言时敢说真话；要在人们能说真话时说好真话；要将真话时常挂在嘴边常说真话；要在讲了真话后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错误后认账改错。讲真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能够做的地方和时间做起，比如从

我们时常看到和听到的社论、报告、演讲和主持人的最后一段空话套话删去开始，讲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管用的真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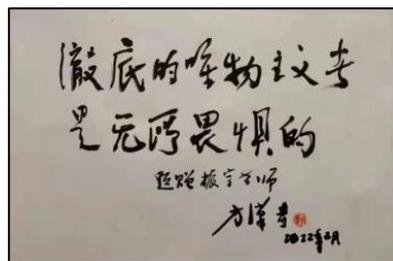
(2009年8月25日《杂文报》)

怎样讲真话、怎样把真话讲好，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和技术问题，同样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19年11月我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讲好真话》一书。这是一本有利于提高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养的普及读本。该书把握时代背景，以积极审慎的政治格局和理论视野，指出人们在不断追求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需求也日益高涨。提倡讲真话，鼓励讲真话，科学有效地进行意见表达，是人们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全书从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四个层面阐述了新媒体时代敢于讲真话、讲好真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说明了培养与提升这些基本素质的意义和方法。指出，当下提倡讲真话和鼓励讲好真话，反对讲假话和惩治讲假话，建立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管理体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整个社会、媒体和公民的共同努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则最终评判认知与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优劣。该书荣获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基金奖励项目，列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共建项目。

2022年2月新春佳节前，中国人民大学一级荣誉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创会长方汉奇先生为这拙著题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方汉奇的题词引用的是毛泽东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方先生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老战士，他从事70多年的新闻史研究。他认为，在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既要反对“左”的也要反对“右”的思想影响。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接见了方汉奇等老教授、老专家。第二日，中央电视台报道社会反响时，在新闻中再次采访了方先生。“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题词，是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写照，更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赵振宇著《讲好真话》，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2022年2月方汉奇先生题词)